

闵虹 高小慧 王宏林 著

#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文士文学

刀其齋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闵虹 高小慧 王宏林 著

#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文学

17  
文学名著  
王宏林



文信堂书店出版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文士文学/闵虹等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2

ISBN 7-5039-3006-3

I. 中… II. 闵… III. ①政治思想—研究—中国—古代

②文学史—研究—中国—古代—IV. D092 I 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3552 号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2001DZM001

华夏英才基金支持出版

##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文士文学

著 者 闵 虹 高小慧 王宏林

责任编辑 金 燕

责任校对 崔建文

封面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http://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mailto: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3006-3/G·581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 前 言

治国可谓最复杂的社会工程，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为建立理想中的太平盛世，分别提出了德治、礼治和法治的治国方略，最终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治国传统。回顾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不难发现虽然汉代以后历代治国思想“年年岁岁只相似”，但历史的演进却是“岁岁年年各不同”，显得那么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因此，重温各个时代的具体经验，探讨各个时代政治的得失，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自然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历史上的德治，就是把道德教化作为主要的治国手段，主要依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通过关心和教育人民大众，来确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地位。在德治社会中，道德与政治关系密切，许多道德规范往往与政治信条身份重合，甚至起到法律条文的作用，这就使道德在维系社会稳定、实行有效统治的过程中具有了不容忽视的权威性地位。

礼治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对于天地鬼神和先祖的祭祀，后来被扩展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在中国社会中，各种政治活动、节日庆典及日常生活都有具体的礼制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礼治和法治有密切关系；但礼治又要求人们对行为进行自我约束，强调人们要提高自身的修养，它和德治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法治是通过建立法制规范，并依靠国家机器强制推行来维系社会

秩序的治国方式。它不强调人们内心的自觉，而是靠外在的威慑力来强制推行。中国古代的法治常常意味着“刑治”，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法”时就说：“法，刑也。”在古代传统观念中，法制就是刑罚，通过镇压和制裁使人民服从。

中国历史上，不少政治家对德治和法治进行了大量探讨和尝试，最终形成了“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德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种传统的奠定与中国历史上三次重大社会政治危机有密切关系。

首先是商朝的灭亡。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后期君主武乙是一个崇尚武力、目无尊长之人，“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纣王更加残暴，利用酷刑来对待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最终商朝灭亡。周朝代商而立后，反思政治经验时认为靠刑罚、武力和上天保佑都不行，唯有高尚的“德”才能保持统治长久。

第二次是春秋战国之际，天下纷争，群雄逐鹿。怎样增强国力成为霸主，是各诸侯和士人追求的目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学一派大力倡导仁政，爱惜民众，奠定了后代以德治国的思想基础。

第三次是强大的秦国结束战国纷争，一统天下，但因为施行暴政很快被推翻。汉代初期，反思秦朝灭亡的教训，统治者认识到：严刑峻法并不足以维持对民众的统治，要想长治久安，就不能任意践踏民众，爱民即护己。于是，儒家德治思想被重新关注，最终被推到治国方略的主导地位。

从德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出，实施德治决不是封建统治者的良心发现，而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需要。

德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不断丰富德治的内涵，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具体来看，其核心是“民为邦本”，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从《左传》的“国将兴，听于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唐太宗李世

民所言：“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都是把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以民心向背作为国家兴亡的条件。因此倡导推恩于民，实行仁政。

其次，主张宽徭薄赋，安民富民。孟子认为：“无恒产者无恒心”，“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把百姓的温饱和国家的安定紧密联系起来。唐太宗李世民也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贞观政要》卷八《论务农》）忧虑粮食减产使民众饥寒而背离国家，要求给予百姓好处，使百姓富裕起来。

第三，主张敦风化俗，省刑宽民。德治并不排斥刑罚，但主张刑罚要简约，量刑要从宽。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强调先通过教导使人民具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如果没有这个教育的过程而直接用刑，就是残暴。

同时，德治思想对统治者的道德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认为统治者的道德既是普通民众效仿的榜样，又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管子就说：“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故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管子·枢言》）认为德就是做出榜样，供人效仿。具体对统治者而言，德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举贤授能。要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以辅佐君王建功立业。

其次，虚怀纳谏。要广开言路，善于听从下臣的意见。特别是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如果言路畅通，下情上达，统治者对国事的决策往往就比较正确。历史上贤明的君主往往能够听从不同的意见，最终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第三，力戒贪奢。要倡导清正廉洁，节制俭约。因此为政者的两袖清风常常与安贫乐道密不可分；崇尚气节、生活俭朴之人在施政时常常能够做到克己奉公。

“文士文学”一般是和“民间文学”相对而言的概念。

从作家组成来看，民间文学常常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文士文学则不然，它的作者都很明确，大都不出文人士大夫范围。除了元代等一些特殊时期，在中国大多数时代，文人常常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甚至位至王侯将相，完全远离政治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较为少见，因此他们对人民疾苦和社会政治形势都有深切的感受，这就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

从创作体裁来看，文士文学最常用的体裁是诗歌和散文，变文、弹词、小说、戏曲一直被视为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很长时间不被古代文人所重视。

从流传形式来看，和民间文学以口头流传为主不同，文士文学是以文本形式流传的，这个特点能够较好地保持作品的原貌。

从风格来看，民间文学常常是粗鄙而新鲜的，文士文学常常深刻而固定，传统风格一旦形成，就成为典范，因此后代不断出现以“复古”为主要目的的文学革新运动。

另外，在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中，“立德”、“立言”和“立功”的三不朽观念根深蒂固，由于立德唯有圣人才具有资格，立功在和平时常常没有机会，立言就成为首选，颇受文人们的重视。所谓“立言”，并非有言皆能成立，须合乎圣人之意，为有德之言，因此在文人的创作中，包含德治思想的文学作品非常丰富，各个朝代对此也非常重视。《毛诗序》即言：“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认为文学关系到政治的成败，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作用，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从文士文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德治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士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忠君爱民的思想，也以辅助君王创建太平盛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们常常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有些人来自民间，深知百姓疾苦，又担任一些政治职务，对各项政治制度实行的效果有着亲身的感受，通过反思历代统治者的

得失和亲身的政法体验，使他们在不断继承前人德治思想的基础上，也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可以说，中国德治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历代文人不断对此加以完善和深入。另一方面，文学虽然属于较高层次的上层建筑，对社会并不发生直接的影响，但中国文学却一直强调文学必须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唯美主义的吟风弄月、无关政治类作品一直没有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提倡民本精神和关注社会现实一直是中国文学优良的传统。因此，发掘文士文学中的德治精神，借以探讨其在文士文学中的发展流变，对研究中国德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目 录

### 前 言 / 1

## 第一章

### 第一节 先秦德治思想及其文化品格 / 1

- 一、概述 / 1
- 二、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以仁爱为核心的德政学说 / 4
- 三、民贵君轻,以德服人——孟子的仁政理想 / 7
- 四、礼主分,乐主合——荀子的化性起伪理论 / 10
- 五、敬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中庸》和《尚书》  
的治国理念 / 12
- 六、道德不废,安取仁义——老庄的无为而治 / 15

### 第二节 先秦德治思想在文士文学中的表现 / 18

- 一、敬天保民——《诗经》为后世提供的德音范本 / 18
- 二、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屈原对美政理想的无悔追求 / 21
- 三、居安思危,以民为本——先秦散文中的德政范例 / 26

## 第二章

### 第一节 汉代德治思想及其文化品格 / 33

- 一、概述 / 33
- 二、天人相副，以教为本——董仲舒与封建帝国统治  
主要意识形态的形成 / 36
- 三、德力俱足，百姓安乐——王充的德治思想 / 43

### 第二节 汉代德治思想在文士文学中的表现 / 48

- 一、戒奢节俭，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汉大赋 / 49
- 二、不虚美，不隐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  
《史记》 / 54
- 三、敦厚中庸，宣汉一统——《汉书》追求的政治风范 / 63

## 第三章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德治思想及其文化品格 / 68

- 一、概述 / 68
- 二、唯才是举，法为治本——曹操的治国理念 / 72
- 三、笃学修行，不坠门风——《颜氏家训》与民间儒学  
教育 / 76

### 第二节 德治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文士文学中的表现 / 80

- 一、离乱思治，慷慨悲凉——志深笔长的建安诗人 / 81
- 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表》与千古贤相  
诸葛亮 / 87
- 三、“厥初生民”，“抱朴含真”——陶渊明诗中的社会  
理想 / 92

## 第四章

### 第一节 隋唐五代德治思想及其文化品格 / 96

- 一、概述 / 96
- 二、选贤任能，戒奢倡廉——唐太宗李世民的为君之道 / 100
- 三、弘扬德教，建构道统——韩愈对儒家传统德治思想的维护 / 104

### 第二节 隋唐五代德治思想在文士文学中的表现 / 108

- 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济世救民的崇高理想 / 110
- 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 / 115
- 三、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刘禹锡的安贫乐道、以德自励 / 119
- 四、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柳宗元的爱民情怀 / 121
- 五、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等自命新题写时事的新乐府诗人 / 125
- 六、“商女不知亡国恨”——以史为鉴的李商隐、杜牧 / 131

## 第五章

### 第一节 宋代德治思想及其文化品格 / 141

- 一、概述 / 141
- 二、“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司马光的从政治国主张 / 148
- 三、德礼政刑相为始终——朱熹对儒家传统德治思想的发展 / 156

四、恶惩善劝，发明本心——陆九渊“心学”特色的德治思想 / 162

五、“格君之业”与“养民有道”——张栻的德治思想 / 165

## 第二节 宋代德治思想在文士文学中的表现 / 172

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范仲淹、欧阳修等宋代散文家的高远信念 / 173

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王禹偁、苏轼等宋代诗人对民众的关怀 / 182

# 第六章

## 第一节 元代德治思想及其文化品格 / 192

一、概述 / 192

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耶律楚材的治国安民理想 / 199

三、忠君、勤政、爱民、律己——张养浩的以德治吏主张 / 204

## 第二节 元代德治思想在文士文学中的表现 / 209

一、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刘因、王冕等元代诗人对德治思想的弘扬 / 210

二、忠臣烈士，孝义廉节——关汉卿等元曲作家对仁政社会的向往 / 220

# 第七章

## 第一节 明代德治思想及其文化品格 / 230

一、概述 / 230

二、“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王守仁对儒家传统德治思想的发展 / 237

三、“积德累仁为法”——朱舜水的为学修身之道 / 240

## 第二节 明代德治思想在文士文学中的表现 / 244

- 一、“力生于德，天下无敌”——刘基等明代散文家对道德人格的重视 / 244
- 二、“若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朱有燬等明代戏剧家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提倡 / 254
- 三、“布仁恩于宇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对仁政和忠义精神的提倡 / 261

# 第八章

## 第一节 清代德治思想及其文化品格 / 268

- 一、概述 / 268
- 二、修德安民，唯尚宽大——康熙的政治识见和治国方针 / 275
- 三、勤廉爱民，君子慎独——曾国藩的从政实践 / 282

## 第二节 清代德治思想在文士文学中的表现 / 286

- 一、拯世济民，经世致用——钱谦益、方苍等清代诗文家对儒家“诗教”传统的复兴 / 287
- 二、宣教化，正人心——洪昇、孔尚任等清代戏曲家的正统道德倾向 / 295
- 三、儒者著书，当存风化——蒲松龄、吴敬梓等清代小说家对人物德行节操的重视 / 302

结束语 / 315

主要参考文献 / 319

后 记 / 328

# 第一章

## 第一节 先秦德治思想及其文化品格

### 一、概述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德治思想作为宝贵的政治智慧，早在先秦这一漫长而艰难的进程中，就已经孕育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

先秦是中国历史常用的一个概念，基本含义指秦代以前，大致包括远古时代、夏、商、西周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三个时期。远古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古代文献关于“三皇”的记载并不一致，比较通行的是指有巢氏、燧人氏和神农氏，三者之所以被历代传颂乃是他们带领民众走出了与鸟兽同群的蒙昧状态，使人类迈向了文明之路。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子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韩非子·五蠹》）有巢氏和燧人氏发明构筑房屋和取火熟食的方法，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处境，故被推为首领。神农氏则是农耕的始祖，汉初陆贾说：“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

食五谷。”（《新语·道基》）“民以食为天”，神农氏尝百草，找到了适合食用的作物，教会人民农耕，解决了这个天大的问题。从而使人民不再仅仅依靠猎取野兽维持生计，拥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也奠定了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看出，“三皇”传说是和民生密切相关的，以民为本成为后世执政的基本理念。

“五帝”指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帝。《国语》较早地记载了“五帝”的传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鲁语上》）黄帝给万物命名，辨明何种有用，从而增加了万民的公共财用；颛顼能够把黄帝的功业发扬光大；帝喾发明历法，使人民懂得四时耕种，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尧使用刑法十分公平，使人民一心追求善行；舜则为了万民的事业而死于野外。可以感到，“五帝”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而是“人王”，他们既有高超的智慧，又能以身作则。在他们带领下，民众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因此被后世景仰。《礼记·礼运篇》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既指财物为天下公养，人人都是主人，权力乃是天下公器，真正毫不利己。“选贤与能”指有才能的人能够走上执政的岗位，因为他们能够带领民众更好发展。“讲信修睦”是指人人都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因此整个社会非常和谐。显然，“大同”社会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安定和谐，富足美满的时代，既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也代表了历代有志之士的最终追求。直至清末，康有为仍重申“大同”理想，孙中山也以“天下为公”号召推翻封建帝制。

夏朝留传下来的文字资料相当有限，从史书记载和传说来看，夏朝之亡与国君桀的荒淫无道有关。桀“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尚书·汤誓》），妄称自己像太阳一样，尊贵地位永不消逝，人民则痛咒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宁愿太阳消失，与昏君一同灭亡。商朝的亡国之君纣同样残暴，他荒淫无度，杀害贤良，最终被兴起于今陕西一带的诸侯国周取代。两位残暴之君都声称天授君权，崇尚暴力，不顾人民的死活，最终招致灭亡，从反面验证了“以民为本”的重要性。聪明的周朝统治者意识到了“天命”和“民意”一脉相承的关系，及时修正了治国的理念，首次明确提出了“德”的观念：

唯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唯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尚书·康诰》）

周文王由于“明德慎罚”而被上帝所眷顾，所以接受了原先由天赐予殷的权力、邦土和人民。看来天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民意息息相关。“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唯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统治者只有关爱百姓，以德主政，慎用刑罚，才能获得百姓的爱戴。周武王意识到“德”既是周人获得政权的手段，也是确保统治权力最有效的措施，自此以后，“明德”日渐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一条古训。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各个学派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增强国力，称霸诸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学一派大力倡导仁政，爱惜民众，主张以仁义取天下，反对暴力强权。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主张无为而治，给予百姓以充分的自由。法家则认为道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主张以法治国，其代表韩非子说：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



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韩非子·定法》）

法是由官府明确公布，基本原则是赏善罚恶，这是驾驭百姓的基本依据。遵守法令则赏，违犯法令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法家认为赏罚之所以有效，乃是人人都有追求利益、远离灾害之心。对有利的事情，自会趋之若鹜；对祸患则避之惟恐不及。治理天下只要利用人们的这种自利之心，掌握好刑罚的尺度，百姓自然都乐意做有利的事情，国家自然繁荣安定。秦朝的一统天下体现了法家政治哲学的胜利，但扫平六国的秦朝却很快亡于平民起义，究其原因则是法家认为人人自私自利，那么人与人之间就无法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关系。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法律常常是君主意志的体现，它保障的是君主的利益，限制的是人民的权利。以法治国成为一种压迫和剥削的手段，意味着血腥和残暴，这样的法律就很难得到百姓的认可与遵守，这样的统治也很难持久。因此，秦朝之后，尽管历代统治者均强调法制建设与严格执法，但治国理念基本上是德主刑辅，一直重视德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

## 二、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以仁爱为核心的德政学说

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孔子自幼勤奋好学，但在 51 岁以前一直没有做过官。只在 51 岁至 54 岁这几年中在鲁国先后做过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此后孔子又周游列国 14 年，然而并未得到各国诸侯的重用。晚年以整理文化遗产、授徒讲学为主，为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诸如人道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注重民族气节等，皆发源于孔子。可以说，孔子思想及其儒家学派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调。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他认为国家的统治者应把民众视为具有万物之灵的“人”，每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和精神需要，因此不能把人